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Anthony
Giddens

现代性
自我
认同

安东尼·吉登斯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馆

学术前沿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著

赵旭东 方文 译 王铭铭 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英)古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5

(学术前沿)

ISBN 7-108-01161-1

I. 现… II. ①古… ②赵… ③方… III. 社会心理学
IV. 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5041 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8 875
字 数 197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4.80 元

学术前沿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3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敝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创新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介绍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FP46/13

致 谢

在写作此书时，许多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过我。我有幸能够在一系列扩大的研讨班上讨论这里所提出的观点，而其中两次是特别具有激发性的，一次是在剑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院，还有一次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社会学系。我要感谢研讨班成员的很多有教益的评论和有价值的建议。还有，许多人都读过这本书的初稿，读得既仔细又富于批评性。这方面我特别要感谢 Zygmunt Bauman, David Held, Lewis Coser 和 Dennis Wrong。我得益于 Teresa Brennan 最多，他对我初稿的评论使我受益匪浅。书中有许多观点显然是得益于 Deirdre Boden，从她长久以来送给我的诸多资料、未发表的论文以及与她的直接讨论中，我收获颇丰。编辑 Ann Bone 对本书的行文格式和内容作了许多修订，从而才使此书得以付梓出版。我还要感谢下面的一些人对写作此书所给予的帮助，他们是 Richard Appelbaum, Katy Giddens, Sam Hollick, Harvey Molotch, Helen Blunt, Avril Symonds 和 John Thompson 等人。

安东尼·吉登斯

目 录

| | |
|--------------------------|-----|
| 致谢 | 1 |
| 引论 | 1 |
| 第1章 高度现代性的轮廓..... | 11 |
| 第2章 自我:本体的安全和存在性焦虑 | 39 |
| 第3章 自我的轨道..... | 80 |
| 第4章 命运、风险与安全..... | 125 |
| 第5章 经验的存封 | 169 |
| 第6章 自我的磨难 | 213 |
| 第7章 生活政治的兴起 | 246 |
| 概念汇编 | 272 |
| 译后记 | 276 |

引 论

在 20 与 21 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现代性(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又重新出现了。社会学与现代制度出现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

就其动力、就其侵蚀传统风俗习惯的程度及其全球性的影响而言,现代制度与以前所有形式的社会秩序迥然有别。然而,它们不仅仅是外在的转型: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由于现代制度的导入所引起的日常社会生活的嬗变,从而与个体生活进而也与自我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事实上,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extensionality)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而本书的目标就是要分析上述这种交互关联的实质,并且提供一套用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概念性词汇。在这篇引论中,我将从整体上对所要研究的主题尽力给予概要的论述。我期望读者能容忍用这种方式所导致的个别重复。

虽然本书的核心是自我(Self)问题,但它主要不是一本心理学的书。本书突出重点是在于关注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新机制的出现。这种新机制,一方面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自我不是由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在塑造人们的自我认同时,不管他们行动的特定背景是如何的带有地方性,对于那些在后果和内涵上都带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个体也会对此有增强和直接的促进作用。

社会学,甚至范围更广的社会科学,都是现代性的制度反思性(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的内在因素,这些内在因素恰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基本现象。不仅学术研究,而且所有形式的手册、指南、治疗著作及自助调查都有助于现代性反思性的形成。因此,在一些场合,我将大量参考社会研究及实际的“生活指南”,它们不是为确定主题而提供文献佐证的手段,而是作为我所要寻求辨认的社会现象或发展趋势的征兆。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有关”社会过程的著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构社会过程的素材。

概括地说,本书的核心是分析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为了证明论点,在一些关键之处,我会依靠理想型(ideal-typical)的研究方法。我力图在现代性的核心之中确认一些与自我的反思性互动的结构性特征。但我并不准备详细讨论在特定的场景中,上述过程是如何运作的,或者存在哪些例外和反趋势。

开第一章便为整个研究勾画出了一个框架。它以社会研究的特定部分作为例证,对现代性发展的关键方面给出评价。除了其制度性反思之外,时空的重组加之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的拓展(这是一种把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而对之加以重新组合的机制),这一深刻过程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时空

重组,加上抽离化机制,导致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导致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的转型。

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但在这种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并没有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现代性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化,并且坚持所有知识都采取假说的形式:某种正确的主张,理论上总是有被修改的可能,而且其中某些部分也有被抛弃的可能。日益积累的专门知识体系(它构成重要的抽离化后果),表现出权威根源的多元化,因此在体系内部,不同权威之间相互竞争,在内涵上千差万别。在我所称的“高级”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即我们现今的世界)的情境下,自我,如同自我在其中存在的更为广泛的制度场景一样,必定是反思性地产生出来的。然而,这个工作必须在令人困惑的多样性的选择和可能性中才能得以完成。

在不确定性及多样选择的情形下,信任(trust)和风险(risk)的概念有着特殊的应用价值。我认为,信任是人格发展中决定性的普遍现象,它和抽离化机制及抽象系统的世界也有着显著的和特定的关联。就其普遍的表现而言,信任与个体早期获得本体性安全感直接相联。婴儿和看护人之间所建立的信任能提供一种“疫苗”,它庇护着婴儿,使其避开那种最为平常的日常活动也会具有的潜在威胁和危险。在这种意义上,信任作为基本的“保护壳”而在自我与日常现实的应对中提供自我保护。它能把潜在的偶发事件“搁置”起来,而个体如果真要严肃地细想这些偶发事件,就会导致他们意志的麻痹,或者,他们就会有被吞没的感受。在更为特定的形式上,信任是自我与抽象系统之间

互动的媒介。这种抽象系统,抽空了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内容,同时又产生了全球化的影响。信任因而生华为那种为日常实践所渴求的“信念”。

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比之以前惯常的生活更为危险,因为对发达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情形并非如此。相反,无论是由外行行动者还是由技术专家来组织的社会世界,风险概念都是基本的。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借助知识环境的反思性组织,未来被持续不断地拖入现实之中。现代性条件下的任何一个领域似乎总是被切割,被拓殖。但这种拓殖本质上不可能是完全的:在对计划与其预期的结果背离的程度进行评价时,风险的考虑是必不可少的。风险评价要求精确,甚至量化,但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评价是不完备的。由于现代制度的变动特征,伴随着抽象系统可变的且常常引发争议的本质,大多数形式的风险评价事实上都包括许多无法估量的因素。

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内,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它同时也导入了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high - consequence risks),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晚期的现代世界,即我所称的高度现代性的世界,是启示性的。这不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导向灾难,而是因为它导入了前代人不会去面对的风险。无论在国际磋商和军备控制方面有多大进展,但只要核武器(甚至只要制造核武器的知识)依然存在,只要科学技术继续卷入新式武器的创造,那么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就有可能发生。而自然,作为外在于社会生活的现象,因受人类的宰制,在某种意义上已面临着终结,这就是生态灾难的风险。而其他后果严重的风险,如全球经济机制的崩溃或极权超级大国的兴

起,是我们当代经验中同样不可避免的部分。

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远距离外所发生的事变对近距离事件以及对自我的亲密关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这方面,印刷或电子媒体明显地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从最初的书写经验开始,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已长久地影响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伴随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发展,自我发展和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正朝向全球体系迈进,这种渗透被愈益显著地表达出来。在某种深远的意义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与以前历史上的人类所聚居的世界显然不同。就许多方面而言,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世界,拥有整齐划一的经验框架(如有关基本的时空坐标)。但与此同时,它也创造出各种新型的分殊和裂变方式。然而,在电子媒体扮演核心的、基本角色的社会活动世界里,不再是鲍德里亚(Baudrillard)意义上的“超现实”。因为这种观念把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的影响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内在参照性混为一谈,而事实在于这些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性的,受它们自身的建构性(constitution)影响所决定。

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以及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了一种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的活动。自我的反思性投射(首尾一贯但又持续修正的个人经历的维系)发生于经过抽象系统的过滤的多元选择的场景中。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生活方式的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传统的控制愈丧失,依据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的日常生活愈被重构,个体也就愈会被迫在多样性的选择中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进行讨价还价。当然,最为显著的是,在商品化的形式中,存在着标准化的影响,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现代性制度的核心要

素。由于今天社会生活的“开放性”，由于行动场景的多元化和“权威”的多样性，在建构自我认同和日常活动时，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愈加显得重要。反思式组织起来的生活规划，其通常被假定是与专家知识相接触之后所具有的对风险的考虑，成了自我认同的结构化的核心特征。

由于生活方式与生活规划相互关联，所以必须首先澄清对它们的可能误解。部分是由于生活方式这个术语已被用于广告和其他促进商品化消费的方面，因此人们就会猜想，它仅指更为富裕的群体或阶级的某种追求，而穷人则多少是被完全排除在对生活方式进行选择的可能性之外的。在某种实质的意义上，这是对的。在国家内部以及世界范围的层次上，阶级和不平等的难题与本书的观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在这里我并不准备具体阐明这些不平等。实际上，阶级分工和不平等的其他基本界线，如性别或民族，可以依据通向自我实现和授权的不同的路径来进行部分的界定，这些将在下文予以讨论。我们不应忘记现代性就是产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在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现代制度同时也创造自我压迫而不是自我实现的机制。然而，推测本书所分析的现象只影响到某种特定的物质环境，这可能是主要的错误所在。“生活方式”也指在严厉的物质束缚的条件下的决策和行动进程；这样的生活方式模式有时也或多或少地包含对更为广泛扩散的行为和消费形式的刻意拒绝。

在地方性与全球性互动之间的一极代表着我所谓的“亲密关系的转型”。亲密关系具有自己的反思性和自己的内在参照秩序的形式。尤其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作为个人生活新领域的原型的“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的突现。纯粹关系是一种外在标准已被消解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也仅仅是为了这种

关系所能给予的某种奖赏。在纯粹关系的场合中,只有通过个体之间相互敞开的过程,信任才会出现。或者说,信任可以不再用这种关系本身之外的标准,诸如亲属关系、社会义务或传统责任的标准来进行界定。同与之紧密相联的自我认同一样,为抗拒外在的变化和转型的背景,纯粹关系就要受到长期的反思性控制。

纯粹关系预设着“承诺”(commitments)的存在,而承诺又是一种特定的信任。反过来也必须把承诺理解为一种内在参照系统的现象:它是对这种关系的承诺,也是对相关的对方或他人的承诺。作为预设的信任机制的一种结果,对亲密关系的需要是纯粹关系所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因此,如许多社会评论家所做的那样,仅仅把当代“亲密关系的追求”看成是对更为广泛的人际社会世界的消极反应,是错误的。可以肯定的是,专注于纯粹关系就经常能够作为防御性方式来对抗外在世界的包围:但这种关系全然充满来自大范围的社会体系中由媒体所传递的影响,并且它能常常主动地把这种影响安排到这种关系的领域中。一般来说,无论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较大的社会环境中,占有和授权过程总是交织着剥夺和损失。

在这种过程之中,个体经验和抽象系统之间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联系。“再熟练化”(reskilling)(即知识和技能的重新获得)无论涉及个人生活的亲密关系还是较广泛的社会活动,都是对抽象系统剥夺后果的普遍性的反应。它是情境变量,并且也趋向于对特定的场景要求作出反应。当牵涉到个人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或者要作出富有命运特征的决策时,个体可能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使自己再熟练化。然而,再熟练化总是不完善的,倾向于受专家知识可修正的特性及专家之间的论争所影响。在联结

个体活动和专家系统的社会空间中,信任的态度并不与更为实际的态度如接受、怀疑、拒绝和逃避融洽共存。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对科学、技术以及对其他形式的、艰深的专门知识,普通人所表现出的态度同样是混合型的,如崇敬和冷淡、赞同和焦虑、热情和厌恶等,而这类态度也表现在哲学家和社会分析家(自身也是某种专家之一)的著作中。

自我的反思性,连同抽象系统的影响,对身体以及心理过程产生广泛的影响。身体的外在“给予”,即在现代性的内在参照系统之外发挥作用变得越来越少,而是成为借助反思来加以自我动员的实体。事实上,对体形大规模自恋式的保养运动所表达的,就是一种深埋于内心的,对身体加以“建构”和控制的主动关怀的表达。在身体运动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如追求特定的养生之道)之间,存在整合性的联结。作为对生物机制和过程的社会化的反映,还有更多、范围更广的重要因素。在生物的生殖领域,由于诸多种类的基因工程和医学干预,身体成了一种要选择的现象。这些不单单影响到个体:在身体发展的个人性方面与全球性的因素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生殖技术和基因工程,就是很一般性的自然演变过程进入到人类活动领域的一些部分。

一般来说,在我所谓的经验的存封方面,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起着一种根本性的作用。现代性与自然之间存在工具性关系的观念,还有在科学观中排除了伦理或道德问题的观念,都已是陈词滥调。然而,我力图依据晚期现代秩序的制度价值来重构这些难题,而这些制度价值通过内在参照性才得以发展。现代制度的全部内容在于创造行动的环境。在其中,秩序的保证依据的是现代性自身的动力学,而它切断了与外在标准,即外在

于现代性社会体制的因素之间的联系。虽然有许多例外甚至相反的趋势,但日常社会生活却变得与“原本”的自然以及与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方面的诸多经验相分离。疯子、罪犯和重病都要在肉体上与正常人隔离开;而“情欲”被“性”所取代,退到后台再也不能登大雅之堂。对多数人而言,经验的存封意味着个体与事件和情景的直接接触变得稀少而肤浅,而这些事件和情境却是能够把个体的生命历程与道德性及生命有限这样广泛的论题联结起来。

如弗洛伊德所想的一样,这种境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存在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所要求的对负罪感日益增长的心理压抑。更确切地说,所发生的是一种制度压抑。我认为在其中占据显著地位的是羞耻感而不是负罪感。羞耻感与自恋密切相联。但如前所述,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自我认同正在日益自恋化。自恋是另一种形式的心理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病理学的对象,因为有了这种机制,自我的认同、羞耻感及反思性规划之间的联结才会存在。

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我们应该依据对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道德问题的压制来理解这种现象,但它拒绝任何答案。“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须的道德源泉的分离。个体的反思规划创造了自我实现和自我把握的方案。但只要这些可能性被理解为主要是自我的现代性控制体系的拓展,那么它们就缺乏道德意味。“可信性”不仅变成超凡的价值,而且是自我实现的框架,但它表现出一种道德迟缓发展的过程。

对存在性问题的压制决不是完全的,在晚期现代性时代,工

具控制的体系比之以前暴露得更为赤裸,并且其负面后果也更为明显,因此出现许多形式的反向作用。越来越明显的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在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关系的情境中,引发一系列的道德难题,而我们不能把它们仅仅推向一方。这些难题召唤种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它们由新社会运动所预言并且帮助引发。“生活政治”,即关注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开始从“解放政治”所投射的阴影中凸显出来。

解放,即进步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普遍律令,在其种种外观上,是生活政治方案出现的条件。在被分工所撕裂并且以种种形式的新旧压迫为特征的世界中,解放政治的重要性并没有降低。而这些先前存在的政治努力已和新形式的生活政治的关注结合在一起。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勾勒出生活政治议事日程的主要参量。正是这个议程要求我们直面特定的道德困境,并且逼迫我们提出为现代性制度所排斥的存在性问题。

第1章 高度现代性的轮廓

让我通过描述一项社会学研究提出的若干成果来展开我的讨论。在这样做时,我不得已要相对武断地把这些成果从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中抽取出来。沃勒斯坦(Judith Wallerstein)和布莱克思理(Sandra Blakeslee)合著的《第二次机会》是研究离婚与再婚的著作。^[1]它描述了婚姻破裂在十多年后对60组父母和孩子的影响。作者指出,离婚是个体个人生活中的危机,它会危及个体安全及幸福感,然而也为他们自我发展及未来幸福提供了新的机遇。分居和离婚及其后果会导致长时间的焦虑和心理困扰,但一如作者所说,由婚姻解体所引起的变化同时也会提供可能性,让个体去“发展情感”,去“建立新的能力和自豪”,去“超越先前的能力以增强亲密的关系”。

沃勒斯坦和布莱克思理指出,夫妻分离是个标志,“它使框定后续行动进程的某种意象发生凝固。愤怒常植根于婚姻解体过程中,并从中得到滋养:配偶一方突然觉察对方与双方共同的密友有染;一方没有任何提醒留下纸条告知对方婚姻已经死亡;一方突然带着孩子离家出走而没有留下地址……”解体的婚姻是令人惋惜的,而不管配偶双方在共同生活时的状况是如何失意和令人绝望。

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愈长,哀痛的期间就愈持久。哀痛源